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把戰爭帶回來！」—評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

Review of " War and Society" , ed. Wang Horng-luen

doi:10.6752/JCS.201403_(18).0018

文化研究, (18), 2014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8), 2014

作者/Author : 王智明(Chih-Min Wang)

頁數/Page : 260-26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4/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3_\(18\).0018](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3_(18).001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把戰爭帶回來！」——評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

Review of *War and Society*, ed. Wang Horng-luen

汪宏倫主編。2014。《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648頁。

王智明

Chih-Min Wang

「戰爭與社會」是一個看似平淡無奇，但是意味深沈的題目。它考慮的是戰爭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尤其是戰爭如何形塑社會，而社會又如何記得戰爭。戰爭不是一時一地有限度的戰鬥，而是長期的資源調度與社會改造。它不只指涉國家之間的軍事鬥爭，也涵蓋了內戰對峙、種族清剿乃至國家暴力等層面。正因為戰爭不只存在於開戰與終戰之間，我們對戰爭的思考也就不能局限於軍事與外交的層面，而要關注戰爭對於社會的長期影響，針對軍需供給的產業結構，敵對狀態的塑造，終戰與停戰的修辭，審判與戰後秩序的重建，佔領與接管下的社會重建與治理，國家祭祀與戰爭記憶，文化再現，乃至於戰士、戰犯與戰俘的戰後安置與轉型正義等問題，一一考校。在歷史與比較的向度上，我們更要追問戰爭概念的轉化與再定義。究竟，為誰而戰，又為何而戰？是以戰為政，還是政不離戰？

在現代史的研究脈絡裡，戰爭是歷史記述的重要對象，例如二戰，戰後或冷戰等歷史分期。但是，正因為歷史與國家緊密相繫，戰爭記述與國族歷史密不可分的結果，往往致使我們忽視了國家戰爭框架之外和之下的鬥爭與暴力。以台灣為例，戰爭相當程度主導了這塊島嶼人民的命運：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將台灣推入國族現代史的輪迴困境，台民的反抗和戰鬥也就消融在殖民綏靖的論述中，乃至於淪為「文明與野蠻」的對立，以及「自治與同化」的拉扯。1927年寧漢分裂以降的國共內戰，更深刻影響了台灣身體與心靈，對外展

現為「反攻大陸」與「解放台灣」的冷戰對峙，對內則表現為思想與身體戒嚴的「白色恐怖」。即令是解除戒嚴、兩岸恢復交流之後，某種精神與情感的武裝仍然以「反共恐中」的形式存在著，抗拒理解與和解；至今未解的「釣魚台問題」更勾引著紛雜的抗日記憶與兩岸矛盾，突顯東亞和平的脆弱與危險。我們幾乎可以說，台灣的現代史就是一部漫長的戰爭史。雖然不至煙硝處處，瓦碎壁殘，但是人民確實是在戰火之間倖存下來的，並在戰爭的修辭結構與國族的記憶之框中學會辨識敵我，蜿蜒前進。近來兩岸電影重拾對戰爭議題的興趣（從《一八九五》、《集結號》、《南京！南京！》、《賽德克·巴萊》，到《金陵十三釵》和《軍中樂園》），選取了不同於1960與1970年代歌頌英雄、緬懷先烈的官方觀點，轉以反省、回顧，乃至批判的方式去重新挖掘戰爭經驗，足見戰爭記憶的詮釋亦是一場未完成的戰鬥。'或許戰事不曾遠去，我們只是學會了遺忘，或是以再現的輕盈承載不可承受的歷史。

正是在兩岸乃至東亞這樣經歷了西方殖民、互相對抗與內部分斷的歷史脈絡下，《戰爭與社會》的出版特別值得我們重視。不同於對個別戰爭的歷史考掘，如美國學者康明思(Bruce Cumings)的《朝鮮戰爭》，以及從外交和國際政治角度的在地追尋，如台灣學者張淑雅的《韓戰救台灣》，或是更為理論性的思辨，如法國理論家波西亞(Jean Baudrillard)的《波灣戰爭不曾發生》，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汪宏倫主編的《戰爭與社會》可以說是一本結合了理論、歷史與多元主體經驗的反思之作。它的企圖不在於抽象地理解戰爭的意義，也不在於具體地考察某一戰爭的歷史，而在於指出國族的思考框架如何制約了我們對戰爭的認識，並試圖從戰爭遺緒與歷史認識的角度，重新檢視戰爭與社會的關係。誠如汪宏倫在〈導論〉中所言，「本書所關注

1 電影之外，解嚴後才逐漸浮現地表的左翼歷史與回憶錄，如藍博洲的報導文學經典《愧馬車之歌》及其一系列的左翼歷史書寫，楊渡的《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以及陳明忠的回憶錄《無悔》，都顯現了戰爭記憶詮釋的無止無休，以及國共戰爭與冷戰對台灣社會的具體影響。無獨有偶，在東南亞，共產黨記憶的禁制與浮現，亦是反殖民與反共戰爭至今未止的表徵。很可惜的，《戰爭與社會》並未涉及東南亞的戰爭記憶。

的，與其說是戰爭與軍事本身，毋寧說是嘗試將戰爭納入社會學的整體思考中，除了『將戰爭問題化』之外，更企圖探討戰爭與其他社會現象（例如宏觀層次的歷史社會變遷、人口遷徙流動、政治治理，以及微觀層次的個人生命經驗、記憶與創傷等）之間的關連」（9）。《戰爭與社會》援引多重的理論視野來反省戰爭及其遺緒：從探討現代性與戰爭的關係（第一章），思索革命與戰爭組態的百年變奏（第二章），到對巴特勒(Judith Butler)「戰爭之框」和「可悼性」概念的引用與深化（第三、七章），戰爭與治理關係的辨證思考（第四、五章），正義與寬恕觀念的再釐定（第六章），乃至於對戰爭零餘主體及其倫理的認同政治、精神分析與實踐考察（第七、八、九章），以及戰爭記憶的文化再現和政治（第十章）。這些不同的議題再再豐厚了我們對戰爭的認識與理解，也讓我們看到戰爭如何在社會裡沈澱、化膿、尋求癒合，卻又每每在爭議時刻噴湧而出，成為我們不願意，卻又不能不面對的「遺緒」。這些複雜難解的問題提醒，更敦促台灣學界與社會，必須正視戰爭及其遺緒，要求我們打破國族之框的制限去認識戰爭的影響與意義，尤其要去關注戰爭烽火下的零餘主體（台籍日本兵、慰安婦、外省老兵，以及那些至今仍流落在外，未受關注的國族邊緣人，例如難民），²因為他們不僅因戰爭而犧牲，更是其暴力的見證。「把戰爭重新帶入我們的研究視野，當成一個理解現代社會的重要線索」，正是這本書的目標與貢獻(12)。

整體而言，這本書包括了三組不同的文章。書的前三章分別從社會理論、百年革命與公民抵抗與東亞戰爭記憶等場域，反思戰爭的相關論述。第一章精準地分析並羅列了社會學理論（主要是克勞塞維茲、韋伯和傅柯）對戰爭的種種思考，指出「戰爭－國家」的觀點如何貫穿了法國大革命以來對戰爭的社會學反省。尤其關鍵的是，本章指出繼法國大革命而起的拿破崙主義如何以總體戰的思維，突出了以

2 難民研究並不是本書正面觸及的主題，但是趙彥寧（第九章）將外省老兵視之為「離散流亡者」的詮釋角度或許可以與內戰難民的思考呼應。關於難民與戰爭，可參考《文化研究》第17期（2013）「難民與移民：後／冷戰台灣的東南亞視野」論壇裡的相關文章。

民族國家為核心的戰爭思考，反向使得戰爭的現實與修辭成為國家與社會治理的重要技術，因此不論是韋伯式的「社會的國家化」或是傅柯式的「國家的治理化」，都試圖說明戰爭作為政治與權力的延伸，如何界定了個人、社會與國家在現代性中的互動關係。藉著追索從克勞塞維茲「必須保衛國家」到傅柯「必須保衛社會」的命題翻轉，作者鄭祖邦不僅將戰爭問題理論化，亦簡要地鋪陳了全書的理論與倫理關懷。同時，他在文章開頭所列舉的歷史化思維（從法國大革命經俄國革命至九一一恐怖攻擊），雖然只是點評，沒有展開，卻為戰爭理論化的工作提供了另一條思路，即革命／戰爭與世界史的關聯，也為第二章的討論提供了一個全景式的觀點。

第二章藉著批判博藍尼(Karl Polanyi)「百年和平」的說法，突出了群眾起義、內戰、反殖民抗爭與革命等「類戰爭」(para-war)情境，從而挑戰了西方十九世紀以降「戰爭與和平」的知識框架與論述觀點。本章提供大量的對比與參照，適切地將戰爭的命題轉向多樣化與連接性的思考。它對20世紀「戰爭共產主義」與「公民抵抗」運動的相互參照，尤其突顯了革命與戰爭組態的變奏，以及「內戰與政治互為延伸」的詮釋觀點(125)。這不僅重新把鄂蘭(Hannah Arendt)對革命的關懷納入戰爭的敘述，更藉著指出「叛亂／革命」的雙重性，將二十世紀反殖民運動、共產革命行動與晚近以「阿拉伯之春」為代表的公民抵抗運動連繫起來，進而指出「世界的去政治化」命題不過是「特定識框下視而不見的悲嘆」(127)。透過提出這一系列相連卻不相同的革命／叛亂／反殖／戰爭系譜，作者朱元鴻提出兩個重要的問題：「對於戰爭苦難能夠或不能夠感同身受的界線在哪兒？是否有可能改變？」，以及「如何以民主問責政治、言論自由，以及分權的制度空間來束縛戰爭，而不再是任由戰爭形塑我們的政治體系與社會生活」(140-141)。這樣的探問不只延伸了傅柯「必須保衛社會」的命題，並將民主的問責機制納入考慮，更點出苦難感受的識別不能只依賴國族之框，而需要我們對非全球高層金融意義下的「相互依存」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第三章則提出「戰爭之框」的概念來討論東亞民族主義與戰爭記

憶的問題，並梳理了日、中、台三地對於二十世紀東亞戰爭體驗的不同認識。作者汪宏倫指出，所謂的戰爭之框包含兩個層次：一是「戰爭所創造出來的結構框架」，另一是「關於戰爭的認知框架」；由於民族國家的存續與戰爭經驗相關，戰爭之框因而也是「國族之框」(162)。換句話說，戰爭之框這個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為了突顯戰爭的正義與失義；所謂「正義」並非是絕對的，而是受到國族化戰爭之框的制約，而這正是東亞各國無法和解，東亞和平依然脆危的深層原因。汪宏倫認為，這樣的思考恰恰可以突顯（反殖民）民族主義對東亞的現代性宰制，因為東亞國家之所以「被迫」走向戰爭，決定「透過軍事武力來建立自己的國家，也正是因為受到西方列強的暴力侵侮」(216)。反思戰爭之框因而也是對現代性暴力與戰爭關連的反省。不過，僅僅以國族之框來理解東亞的戰爭記憶，或許忽略了戰爭之框中隱含的種族主義與歷史意識，也讓人不禁懷疑，究竟是國族化的戰爭之框決定了記憶，還是國族的歷史與種族意識鞏固了戰爭之框？戰爭之框這個概念的提出，究竟是對國族記憶的超克，還是再肯定？僅「在不同識框之間轉換」(213)，而不考究國族與種族意識的交纏，又如何對戰爭之「義」提出批判性的理解？

第四、五、六章將戰爭的思考從國家社會的外部延伸到內部，分別從國家治理、社會治安與正義倫理的角度切入，探究社會如何作為戰爭的延續，並追求正義、寬恕與和解。第四章以朝鮮戰爭為例，闡述中共如何透「抗美援朝」運動進行「社會征服」，並指出：與其說中共是因為共產主義的國際連帶而投入了支援朝鮮的戰事，還不如說是朝鮮戰爭的爆發，提供了中共藉由反帝愛國思潮進行社會動員與改造的契機。戰爭與治理因此是相互連動的，是一種共構關係，就像是「連體雙胞胎」一樣(278)。其對連動性的關注也呼應了克勞塞維茲「戰爭乃是政治的延續」這個命題。然而，克氏以「政治為常態、戰爭為非常態」所確立的政治—戰爭主從位階，未必一成不變。將焦點從朝鮮戰爭移轉到「抗美援朝」運動，作者黃金麟提出了「以戰為治」的命題，迫使我們思考這究竟是偶然、還是常態，進而撼動了「從開戰到終戰」的線性敘事和思考。他強調，究竟何者為常態，何者為例外，或許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關鍵還在於戰爭如何介入了治

airiti

理的過程，而社會的治理與征服又如何利用了戰爭。第五章延續這個「以戰為治」的命題，並將焦點轉向台灣。不過，本章一開頭就試圖重新定義傅柯「必須保衛社會」的命題，企圖鬆動種族排除式的社會想像，轉向思考內部他者與治理的關係。其核心提問是：國家如何區辨其敵人？當所謂的敵人長期處於社會內部的時候，這個社會又會變成什麼樣子？透過整理日治時期與戰後台灣報章媒體上所紀錄的「治安戲碼」，作者姚人多發現，不論是「土匪」還是「匪諜」都是國家的敵人，日治和戰後的論述或許有些具體而微的差異，但核心不變的是，敵人總是存在社會內部，因而需要被辨視、防備與殲滅的想像。台灣社會就是在這種敵影幢幢之中所建立起來的共同體，「它是一個長期處於政治敵我區辨凌駕一切的社會，它也是一個總是企圖要消滅一群人來保障本身共同體的純潔與安全的社會」(342)。就「以戰為治」的命題而言，姚人多耙梳的治安戲碼或許新意無多，可是他藉以勾勒出的台灣社會，卻清晰地展現了戰爭無孔不入、不止不休的感受與面貌。用他的話來說，「社會就是戰爭的延續」(342)，戰爭的問題因而也不會因為終戰和解而消失。戰後的社會如何面對戰爭才是更為重要的關切。

「戰後」正是第六章關注的問題，而正義與寬恕，記憶與遺忘的倫理則是其辨證的焦點。本章是全書最具詩意的一篇，也是對戰爭之框最根本的批判。從戰後正義如何可能的難題出發，作者朱元鴻指出，東西兩方的戰爭創傷，至今都無法超越國族化的戰爭之框，也無法透過審判與寬恕，切實面對真相，達成和解。面對國家的暴行，記憶雖是見證與控訴，卻難免被鑲入國族的敘事，被阻絕、操縱和強制。如果真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言，寬恕/悔罪的追索不過是亞伯拉罕傳統在全球化劇場的演出，不過是將正義的責問與傷痛的紀念讓渡給國家，成為其正當性的來源或團結國族的神話，那麼更為核心，且具批判性的提問，恐怕不是記憶，而是遺忘，這也就是作者所追問的：「在什麼條件之下，遺忘可能作為倫理學上具有意義的行動？」(354)。朱元鴻考掘，並借用魯迅〈題三義塔〉的詩句，重新勾勒遺忘的倫理。他強調「兄弟」不必然是自然血緣的民族同胞，「劫波」亦不必指認罪責的方向，而是兩造的共同苦難，如此「相逢一笑」才可能

是一種記憶的倫理，使得「泯恩仇」的釋懷得以發生。換言之，寬恕與遺忘要求的，不是刻意或強制的忘卻與接受，而是「能夠更新的、不受仇怨禁錮的、不再教條僵化的、放下牽掛的、無憂的、不一樣的回憶」(388)。這樣的倫理想像，不只蔑視國族主權的代理權力，不讓政府或政黨僭奪代表，更昭示一種對反紀念的可能，也為「戰後」指引了一條和解與重生的道路。在這個意義上，戰事止息並不意味著終戰的來臨，唯有直面歷史、了解並改正錯誤，我們才能從戰爭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也是「社會乃是戰爭延續」命題更重要的啟示。

延續著第六章對「戰後」的追問，第七、八、九章考察不同的零餘主體如何承載戰爭經驗，探索戰爭創傷的持續性效果。台籍戰犯、慰安婦與外省老兵是台灣的戰爭現代性中三種最為典型的零餘主體，他們是被國族化的戰爭之框所排除、否定與遺忘的飄零群體，也因此，他們的存在與再現挑戰著國族的意義，要求我們在戰爭之框之外，重新尋找與定義價值與生存的倫理。第十章則是透過對電影的分析，對戰爭主體經驗進行補述與後設思考。

第七章借用巴特勒的戰爭之框，去思考台籍日本兵的「可悲傷性」與「生命價值」如何在戰後的相關論述中被逐步建立。作者藍適齊分析了兩組互動的歷史論述來思考這個問題：一邊是以戰爭家屬，地方民意機關和民間團體為代表的社會力量，另一邊是由中華民國各級單位所組成的國家力量。一邊以家庭倫理為核心，要求肯認台籍日本兵的可悼性，另一邊則因為「對日抗戰」的戰爭之框，而無法正面認可台籍日本兵的生命價值。這樣的差異一方面突顯了國族化的戰爭之框如何定義「國族主體」，另一方面也昭示了超越國族框架重建生命價值的重要，從而提醒我們必須以更包容的態度來看待戰爭記憶的差異，並從中提煉新的記憶倫理。第八章則從臨床精神分析的實務操作經驗出發，思考戰爭創傷如何可以被療癒，又為何無法被療癒。此章很長，但讀來並不雜沓，反到可以看出作者思想之細密及其與理論和實務對話的繁複。這也讓我們看到戰爭創傷的問題，不只來自於戰爭的殘暴，更往往在戰後的國族建構與父權思維中，化膿生瘡。更重要的是，一味的將慰安婦視為

受害者的建構，以及全然反對將慰安婦當成受害者的主張，都暴力地否認，乃至抹去個別慰安婦自身的主體性。作者彭仁郁強調，唯有聆聽與相信她們能夠訴說的能力，我們才能在她們的經驗中看到不是空洞化，蒼白化的弱勢主體，而是獨特而有個性的，是在極限狀況中仍然具有倫理實踐能力的創傷主體。作者更強調，「承受不同戰爭創傷的群體之間的相互認納——聆聽彼此創傷敘事，成為異質複音集體歷史繼承者——是允許衝突撕裂後獲得修補、共享社會生活的必要途徑」（499）。對當今仍充滿認同與記憶差異與衝突的台灣而言，這是尤其重要的提醒。第九章所談的流亡主體（即孤落失怙的外省老兵），儘管風燭殘年，亦是具有倫理實踐能力的行動主體。作者趙彥寧精彩地分析了國共內戰與兩岸分隔，如何對這些底層士兵造成無以彌補的傷害，不論是被迫離開原鄉和母親的恐懼，還是從軍時期的痛苦與匱乏，都揭露了這些流亡主體身上所銘刻的戰爭印痕。而他們與陸籍看護之間的互動，與大陸親友不乏創痛與計算的往來，以及晚年透過婚配所表達的倫理實踐，則提醒了我們：即令是近乎魔幻寫實的行動，或是狀似虛擬和精神病態的身體勞作，也是「突顯生命本質意義的親密關係倫理實作」（536）。關鍵的是，作者強調，這樣的外省老人需要的，並不是談話治療與知識賦權所能給予的自我認同，而是透過各種日常倫理實作——或許服膺黨國霸權，或許違反工具理性——所建立起的「另類親密關係」（563），得以在他們生命將盡之際，聊以寬慰與彼此照顧。兩位作者儘管分析對象不同，對處理創傷的想法和取徑亦有差異，但八、九兩章並列確有互相燭照之功，也讓戰爭創傷的問題可以與倫理實作連結起來，豐富我們對於戰後零餘主體的認識，以及貫穿他們斑駁生命的正義與倫理命題。

第十章藉著討論2008年後三部台灣電影——《一八九五》、《海角七號》與《賽德克·巴萊》——來思考電影如何重塑與生產當代台灣社會的戰爭記憶，及其記憶的政治。作者莊佳穎引用電影評論家孫松榮的說法，以略帶詩意的語言將這三部電影比喻為「來自戰地的明信片」，並指出「這三部電影細緻的音像布置創造了一個團結一致的神話，而電影生產與消費，則成為了一個淨化的儀式……為台灣社會偽造了一個差異和矛盾暫時消弭的共體感」（598）。不同於戰爭之框所強調的國族歷史大敘事，作者認為這些電影所產製的戰爭，乃是「經

過多重篩選、書寫、複製、剪貼之後的文化商品」，除了好萊塢戰爭電影的影響外，還有獨特輕巧的日式元素，因而呈現了一種「輕盈的」姿態和歷史感(610-611)。但同時，作者也強調，這些借存在戰爭歷史裡，圍繞著電影主角周邊的「美麗小故事」，不只「消解了大敘事結構中，巨大的、一元的、由上而下的戰爭書寫」，更以製造「暫時的共體感……弔詭地成為臨時用以縫合台灣內部分歧的黏著劑」，因而具有促成「記憶的民主化」的效果，讓台灣社會可以「自1895年以降的戰爭遺緒中自我鬆綁，而每個社會成員也可以在隨意中介、轉譯、詮釋戰爭記憶的過程中，進行自我和歷史的自由對話」(612-615)。莊佳穎的分析，確實對「戰爭與社會」這個沈重的命題提供了文化記憶的不同進路，也在全書的結尾帶來一絲輕飄飄的解放感。然而這種「輕盈的、偽造的、暫時的共體感」，究竟對台灣社會意味著什麼，又表述了怎樣的戰爭之框與記憶倫理？缺乏了對歷史事實的考察，僅以影像擷取轉譯的「一八九五」、「霧社事件」或「嘉農」，真的可以成為「縫合台灣內部分歧的黏著劑」嗎？若是將鈕承澤導演的《軍中樂園》一併納入考慮，那麼這一張來自戰地金門的「冷戰」明信片，又該如何被縫合與接納呢？「記憶的民主化」或許不該只是記憶的「相對化」與「輕盈化」，而是對歷史真相的持續追索與承擔。

上述的摘要與點評希望能夠具體而微地呈現本書的洞見與不見，並將戰爭及遺緒的重要問題帶進台灣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思考裡。綜覽全書，讀者應該不難發現編者與作者的用心與用力，希望在理論、歷史與主體經驗的不同層次上，豐富我們對戰爭的理解，也強調戰爭之於台灣、東亞乃至全球社會的影響與意義，仍在持續的作用與更新著。但同時，它也遺漏了幾個重要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的追尋和探索。例如，在理論與歷史層次上，戰爭與資本的關係究竟如何發展與轉變，亦即如何思考所謂的「軍事工業複合體」對當代社會的影響？它又如何與政治發生關係？美國所謂的「對台軍售」，顯然是軍工複合體透過東亞地緣政治深刻影響台灣的一個重要案例，而美國「台灣關係法」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則揭示了法律與戰爭的思考面向。同樣的，美軍在日本沖繩與南韓濟州島，乃至於太平洋群島等地的軍事部署與軍事基地，也當是戰爭與社會的重要關切。作為唯一在環太平洋

地區沒有美軍基地的地方，台灣的特殊性不言可喻，但這也不意味著美軍的勢力不在台灣。透過日美與韓美安保體制的確認以及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宣示，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戰爭的幽靈仍然盤據在後冷戰時代的東亞上空。如何在歷史與主體經驗層次上，進一步分析台灣在國際政治局勢當中的位置，並找到解脫之道與和平之鑰，應是當務之急。另外，在記憶之戰的問題上，如何藉著挖掘難民問題、共黨記憶與華人離散等相關議題，參照東南亞的歷史與中國革命經驗，從而相對化東亞的戰爭記憶糾結，也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工作。

當然，一本書的作用不在於窮盡所有的問題，而在於開啓對話與思考。《戰爭與社會》顯然已經做到了這一點。閱畢全書，我們不難發現，原來，戰爭從來不只是槍炮戰略，制敵機先的作為而已，隱身或是獻身於戰爭的身體、淚水、心情與理念，其實才是戰爭最為深入人心、發人深省之處。誠如廣島原爆紀念館前的銘刻（「請安息，因為我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所揭示的，記得戰爭不是為了記得仇恨，而是要記取教訓，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唯有如此警惕未來，我們才可能從仇恨的深淵中、在戰爭的廢墟上，以及記憶的困頓裡重新站起，珍惜彼此，展望將來。